

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地区商会史研究范式的构建

张原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民族研究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开展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商会史的研究,对深刻认识20世纪以来中国民族边疆地区的社会转型,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借鉴历史人类学相关的研究视野、考察方法和关怀旨趣,构建民族地区商会史的研究范式,不仅有助于这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也能弥补以往商会史研究的诸多空白和局限。

〔关键词〕 历史人类学; 民族地区商会史; 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 C9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5) 02-0033-07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15.02.005

当前关于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研究探讨,在主题和方法等方面已多有突破,然而基于商会史的考察,来呈现近代以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和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变迁之研究则相对薄弱。直至2006年《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一书的出版,国内才有了第一部将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发展整合起来考察的学术著作。^[1]但这样的研究仍未成气候,学界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的认识和理解有待提高。相较而言,国内其他地区的商会史研究则发展迅猛,成果丰厚,影响巨大,不仅拓展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还带动了区域经济史、地方社会史、城市文化史等专门领域的发展,并深化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市民社会建构、公共领域兴起等问题的探讨。^[1]西南民族地区的商会史研究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变迁发展的考察、区域民族关系的探讨,以及民族史研究的领域拓展,均能提供一种新的视野。当然,西南民族地区的商会史研究无论在

问题意识、理论方法,以及关怀主旨上都会与当前中国主流的商会史研究有所不同。本文试图援引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并结合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之实际情况,在反思以往商会史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西南民族地区商会史研究的范式构建问题。

一、问题: 民族地区商会史研究视野下的社会转型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恰处在封建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渡时期,是一个帝国历史的传统延续和国族政治的现代变革相互碰撞并接的时代。而社会形态和文化观念的种种断裂与延续,则使得中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现代化变迁具有其特殊的历史复杂性。在近代中国社会建构现代性的国族政治和国家形态的过程中,可看到两种社会力量的相互纠缠:一方面,现代国家的行政力量作为一种从上至下的权力机制,不断向传统的民间社会伸延,全面地渗透到社会基层之中,从而深刻地改造了基层社会的权力格局和生活形

〔收稿日期〕 2014-05-08

〔作者简介〕 张原(1978—),男,贵州贵阳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人类学、西南民族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民国商会与社会转型:贵州安顺的商会与商绅(1935-1949)”(项目编号:10YJC840049)阶段研究成果。

态；^[3]另一方面，诸如商会、商帮这样的组织团体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则深度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之中，并对社会生活之现代性形塑与现代国民身份的塑造产生深刻影响。^[4]这两种力量的交织互动，不仅贯穿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之中，也有力地推动着近代中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转型和文化观念变迁。

从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转型来看，近代以来商绅阶层的生成与工商型小城镇的兴起，对其社会转型的助推作用不可忽视。^[5]费孝通在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分析中曾指出，皇权、绅权与帮权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权力构成基础。^[6]乡村、集镇和城市的三元关系，则是这一社会形态和权力结构的空間表现。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则集中体现于，商业性的贸易市镇和通商口岸的兴起促使士绅阶层表现出城镇市民化和工商化的倾向，由此导致了城乡二元的社会分化。^[7]与此对应，民族地区也涌现出大量的商帮、商会等组织团体，重塑了当地的社会组织形态与权力结构关系。^[8]这种社会形态与权力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现代商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9]并对区域性的民族社会关系的整合和跨区域的民族商贸关系的连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民族地区文化观念的变迁来看，近代以来新型的商业精神与传统的伦理价值逐渐融合，使得商业开拓的民族精神在中国西南的许多民族中得以形成发展。^[10]而民族地区的地方商绅通过商帮、商会等团体来积极推动参与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则表明商绅作为一种行动主体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所遵循的观念基础和价值指向，既是传统道德伦理的一种延续与坚持，也是现代民族精神的一种开启与彰显。这也使得近代中国所出现的传统士绅伦理与现代商人精神的嫁接合流趋势，在民族边疆地区获得了新的内涵和表现。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商会与商绅实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种重要力量，在参与地方事务、构建公共领域、影响政府行政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在民族地区成长起来的商会与商绅，则对多民族杂居共处的边疆社会的民族关系形塑，及其社会文化的变迁发展，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探讨民国时期的民族地区那些初具现代组织形态的商人团体

在时代变革中扮演着怎样的社会角色，以及分析颇具现代民族意识的地方精英和传统士绅气质的商人群体在社会变迁中又有着何种时代境遇，对于我们以中国社会为本位主体，从自身的历史经验出发，围绕中国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研究的问题主旨，来构建相应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式而言，意义重大。所以，与国内主流的商会史研究主要关注“国家—社会”的关系不同，西南民族地区商会史的研究应基于社会转型这一核心问题，在民族关系互动、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变迁、文化观念整合等专门研究领域有所拓展，从而形成自身的考察体系和研究范式。

二、视野：历史人类学的分析路径

当前国内的商会史的研究立足于社会经济现代转型的客观历史过程之考察分析，虽具社会史注重经验实证之长，然而其问题意识也确有紧跟西方相关理论之嫌。特别是最近十余年来，商会史的研究在“国家—社会”理论框架的影响之下，兴起了对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讨论，这对于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虽有一定的突破，但是基于西方特殊历史经验所诞生的社会理论在用于解释中国社会时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弊。^[11]所以借用诸如“公共空间”、“第三领域”这类概念，来开展民族地区商会史的研究要十分谨慎。此外，商会史的研究过于集中在上层的商务总会，或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商会中，而对县级基层商会，特别是中国西部长江上游地区的相关研究相当薄弱。^[12]国内的商绅研究所突显的则是中国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社会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所具有的一种延续性。如通过对近代中国“绅商合流”所形成的商绅阶层与“绅型乡镇”的考察指出，中国基层社会在经历商业贸易化的变迁同时，仍保留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种种结构和形态特质。^[13]又如在对“土商互动”所导致的文化价值变迁的分析中，展示了近代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如何重构宗教伦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复杂过程。^[14]这些研究虽具有文化史考察的本土视角本位，但其对社会权力格局的考察与对文化精神心态的理解却未能统一为一个体系化的研究领域。因此如何构建出中国式的商会史研究理论体系，成为近年来学界用力之方向，而民族地区的商会史研究则

更应从具体的现实历史、社会形态和文化特性出发，构建其研究范式。

开展民族边疆地区的商会史与商绅研究，必然涉及“如何理解历史过程、社会形态与文化观念三者关系”这一问题。怎样处理转型变迁中的断裂性与延续性之关系，以及历史过程中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的互动影响，则是相关的考察明确其问题意识，并获得一种整体性的方法视野和研究框架之关键。历史人类学这一视野与方法，其形成得益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交集碰撞与互补发展。将其相关理论方法援引至民族地区的商会研究中，将有助于我们将社会、文化与历史过程三者关联起来，获得一种总体的研究视野和深刻的考察路径，从而开拓出新的研究范式。

擅长微观考察和底层研究的人类学，对于史学研究的方法启发和视野拓展作用明显。受人类学强调关注大众基层社会、持续日常的生活世界和当地观点（native view）之影响，西方学界对以往史学中过于重视精英上层社会、断裂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外在史观的研究传统进行了反思。^[15]最终，法国年鉴派史学在其“人类学转向”中，逐渐形成一种更为关注“基层史”（history from below）、“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和结构史的历史研究风格。^[16]涌现出了诸如《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等一批关注于历史上那些边缘的基层乡村社区和底层的平凡大众的日常生活、风俗信仰和精神态度的史学作品。这般比同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传统的史学叙述风格之形成，突显了新的“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对于平常社会情景与地方文化体系之结构延续性的一种关注。当然，历史学在经历了“人类学转向”后，如何在结构性地还原小地方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与心态之时，也能过程化地对大体系历史变迁中的事件与局势有独到的呈现，则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如在“法国史学革命”的浪潮中，伴随着“人类学转向”的却是年鉴学派第三代学人“回归政治”与“叙事复兴”的风潮。^[17]因此，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并非为简单的获得一种“视野向下”与“面向生活”的研究框架，更在于其激发了史学家获得考察日常生活史、民间文化史与心态史的研究意识，并促成了史学研究在对历史进行分析时去直面人们真实的生活世界，意识到生活世界中的历史其实是

由社会来承载和文化来再现的。这正是历史学在“人类学转向”之后视野的真正拓展。

“历史化趋向”的人类学则突破了以往人类学对其所研究的社会与文化进行的“无历史想象”与“零时间虚构”，并在超越现代西方观念中有关“历史”的知识经验的过程中，重新界定了“历史”这一概念。如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研究中，历史被视为文化结构的一种建构过程和再现形式。^[18]这促使之后的人类学研究不仅越发重视考察社会与文化的历史过程，并最终确立了“文化界定历史”之研究原则。^[19]如此一来，“历史化趋向”的人类学，一方面在强调文化对历史的制约之时，于结构主义的基调上获得一种具有过程论分析的客观性；一方面在关注文化在历史中的再现之时，于理解他者历史的努力中形成了一种重视“历史感”（historicity）阐释的主观性。人类学强调，历史感作为人们关于历史的集体经验与文化理解，是由文化所确立的体验与理解历史的方式，系建构和再现历史之关键。^[16]历史感的考察不仅涉及人们对历史过程的文化阐释，也包括了历史过程的再现形式。基于历史感的理解阐释而形成的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类考察，则丰富了人类学历史研究的主题，使得历史表达、历史记忆等研究得到了深入的拓展。将历史感作为研究关键，表明“历史化趋向”的人类学对历史的关注，实为要通过考察历史，来更好地分析社会与理解文化。

无论是历史学“人类学转向”中的视野拓展，还是人类学“历史化趋向”中的立场确立，均表明历史人类学并非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简单叠加组合，而是这两个学科在试图克服现代社会科学中因种种二元对立观念而出现的困境时，借助历史人类学这一新视野来重建一个更为整体性的考察框架，以期实现结构与行动、持续与变迁、外因与内由、客观与主观、物质论与观念论、世界体系与地方基层间的研究统合。可见，历史人类学的这种整体视野能帮助我们真切地认识历史、精准地把握社会、深刻地感悟文化。所以将历史人类学援引至民族地区的商会史研究中，有助于克服以往商会史研究过于宏观外在和注重精英上层的视野盲点，及其叙事断裂和权力主导的研究弊端，从而让研究回到民族地区现实的社会生活场景之中，将分析路径集中于“文

化如何制约历史”与“文化如何在历史中繁衍”这两个历史理解的关键问题之上。最终，通过展现在国族政治建构和国民塑造过程中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纠结的权力格局，来探析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节点上，现代的国家权力和社会制度是如何改造民族地区原有的权力格局和社会结构的，以及边疆社会传统的伦理精神和文化价值又是如何在社会变革和生活实践中得以延续发展的。

三、方法：历史人类学的考察路径

历史人类学的整体视野强调，历史的表达呈现并非依赖于那些所谓“正式的”文字材料和“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更值得关注那种深嵌于人们生活经验与观念心态中的历史感知。所以历史人类学所要考察的正是那些不被眷顾或书写的历史，依托于地方档案文献、人生口述历史与社会集体记忆这三类材料，来揭示被压抑的历史，从而贴近历史本身，是其考察历史的基本路径。因此西南民族地区的商会史研究，可由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考察路径来展开。

（一）地方档案的发掘解读与社会生活史的微观考察

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代表作《蒙塔尤》，开创了一种微观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并创造出一种从档案出发来研究社会生活、民间文化与心态史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勒氏利用法国中世纪一个小山村的宗教审判档案来重构这个社区的日常生活与民众心态，并将《蒙塔尤》定位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社区民族志，由此档案记录作为社区直接提供的历史证据，能够让学者直观地把握到社区的日常生活与村民心态。^[20]这种从地方档案文献入手来考察社会生活史的方法，能够生动呈现历史上具体鲜活的社会情景与人物形象，也让研究者们能更为真切地贴近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从而通过对一个小地方的描绘，来还原一个时代的历史情况。西南民族地区的商会史研究可借鉴此方法，基于地方档案和民间文献的发掘与解读，对民国时期民族边疆地区的社会生活与观念心态加以描绘，以还原当时当地的商会与商绅所处的社会文化情景。这不仅有利于深入辨析地方商会在时代变迁中的角色地位

和功能作用，也能生动呈现商会人物的历史形象和社会实践，从而能就民族地区边疆社会的现代转型进行深度的描绘与理解。这方面的研究尝试中，中国学者已开展了不少工作，且在档案材料整理方面也有不少积累。^[21]

（二）口述历史的调查研究与人物生命史的总体呈现

以口述历史的方式研究地方人物的生命史，是人类学考察历史的一种重要路径。为打通个人口述的历史叙述与社会整体的历史过程的关系，王铭铭提出，应将个人的生命史，特别是地方重要人物（big man）的人生史并入口述历史的研究范围中，通过研究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来呈现地方社会的历史过程。因为地方重要人物复杂而丰富的生命历程，正是以人生所书写的一种集体历史，这些人物一生之整体也构成了其生活的地方的整体史，且这些人物的个人能动性往往表现为对这一地方性总体历史的贡献，他们的生命史与地方的历程息息相关。^[22]口述史与生命史的研究结合，是将小地方之“大人物”的生命历程放大到历史整体，又将历史事件延伸至个人的生命历程，从而看到社会文化与个人的历史交织。这一既有微观心态探究又有宏观社会分析的整体性考察路径，使得人类学的历史研究有了一种整体的透视感，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尝试以刘琪的《命以载史》^[23]为代表。借鉴这一方法，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商会史研究中，应针对地方上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特别是商界和商会中的一些典型人物，来展开口述史的调查和人物生命史的研究。在具体的考察路径中，一方面可将人物个体的生命历程放大为一个历史的整体，以此作为纵向的线索；一方面则将特定历史事件作为横向的线索，来牵扯出不同人物的命运是如何交织在一起。^[24]在这样的历史纵横之间，事件和人生、社会和个人都被联系在一起。如此，一种具有整体观的口述历史研究和人物生命史考察便能落实于民族地区的商绅研究中。

（三）社会记忆的考察分析与文化观念的历史还原

由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开创的“集体记忆”研究强调，人们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记忆的，因而记忆是集体性或社会性的，且存在着一个记忆的社会框架，过去存储于社会机制

之中，并被其解释。^[25]实际上，“记忆具有社会性”这一论断具有双重意义：过去既是经验的记忆，更是观念的记忆。所以在研究中，应将记忆的内容和形式与社会观念相关联起来，在思想观念图式中考察记忆。^[26]正如哈布瓦赫指出，社会记忆的框架是由观念组成的，而这些观念总是化身为个人和群体的记忆之中，因此“没有不同时又是社会记忆的社会观念”。只要每个人物、每个历史事实渗透进了这种记忆，就会被转译成一种观念并获得一种意义，成为社会观念系统中的一个要素，这也正是传统与现在的观念能够共存的原因。^{[25] [311-313]}由此，考察社会记忆不仅是还原社会建构的一种历史，也是在展开一种思想观念史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社会记忆的研究也必须从对个人的考察来展开，其最为关键的是对个人生活史的研究。如康纳顿（Paul Connerton）所强调的，只有把当事人的行为归位到他们的生活史中，才能把他们的行为还原于其所属的那个社会场景下的历史中加以去理解，从而呈现社会决定的不同记忆结构。^[27]借助于这一考察路径，研究分析民族地区对于民国时期的商会与商绅的社会记忆，则可以从当地保留延续的丰富而生动的大量关于商会和商绅的历史记忆中，去辨析人们对于过去的理解和对于现在的解释所依赖的社会环境与思想观念。当然这一考察路径是与地方人物的生命史相结合的，并且是围绕着历史行动者的生命历程、形塑记忆的社会环境，记忆生成的观念图式这三个相互关联的事项来展开社会记忆的考察的。

将地方档案的发掘解读、口述历史的调查研究与社会记忆的考察分析这三个历史人类学方法路径综合起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商会史研究可以把社会生活史的微观考察、人物生命史的总体呈现、文化观念的历史还原三者统合为一个研究整体，从而去贴近和揭示那些被遮蔽和压抑的地方历史。当然，这种地方历史实为一种经验累积与心态呈现的过程，而生活实践、社会形塑与观念生成作为历史过程的一种同义反复，将历史本身内嵌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与过往记忆之中。

四、旨趣：地方感与历史感的呈现

遵循历史人类学的考察路径，西南民族地区的商会史研究就能以一种更为动态过程的视野和

整体全面的方法，来对这一地区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过程进行一种有意味的叙述编撰，从而帮助我们认知理解一个充满“地方感”（place consciousness）的历史，并还原与呈现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感”的地方。

呈现历史的“地方感”，也就是在地方的生活世界中呈现历史。地方社会作为一个具体的生活实践场域，不仅拥有其特殊的价值观念图式和社会组织结构，也有其独特的历史感知体系。所以在历史考察中强调“地方感”的研究，能将那种被普遍性的价值与话语所遮蔽的历史之地方性揭示出来，这正是史学界在“人类学转向”中所形成的更为关注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之研究旨趣的一种体现。在中国，一方面由于“国家—社会”的关系被设计成一种在空间对立状态下的相互自主的结构形式，因此关注现代国家化的过程中，基层社会复杂的文化内涵与秩序特征如何保持其自主性和主体性，成为学界关注地方感的一种深刻的动机与关怀。^[28]另一方面，“地方”作为一种感知路径，也是赋予现代性的历史变迁以一种真实的价值观念（authentic values）的地点，因而其也是表征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9]所以，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商会与商绅的考察，就是要力图展现民族地区对社会现代转型的感知认识与理解体验，从而探究社会历史变迁中具体地方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形塑与表征展现。这里所谓呈现历史的“地方感”，其旨趣在于把握民众在地方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历史感知和现代表征，并以一种更为贴近现实生活经验与价值心态的研究视角，去重新认知和评判发生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现代性转型之历史过程，最终在基层社会的生活世界中去探寻中国现代性变迁的独特轨迹。

理解地方的“历史感”，则是要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与文化脉络之中，贴近人们地方性的社会文化逻辑，来感知领悟人们对过去的再现与建构方式。人类学对于历史过程的理解和阐释是基于对“历史感”的把握而进行的，这也正是人类学“历史化趋向”后所获得“文化界定历史”之原则旨趣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正如大贯惠美子（Emiko Ohunki-Tierney）所指出，“历史感”并非文化所给定的一个沉默的东西，它还包括了卷入其中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遵照集体的关于

历史感的观念，来利用、选择并创造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这也使得过去与现在可以通过隐喻与转喻的关系得以相互依存与相互决定。^[16]因此作为人类学历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和中心问题，“历史感”这一概念使得关于历史的地方经验与文化理解之考察，成为探究地方生活世界的一个关键路径。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而言，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着极强文字书写历史传统的国度，因此对地方“历史感”的理解也成为历史地还原地方的社会情景与文化脉络之关键。这一研究旨趣带来的是一种新的历史编撰形式，能克服传统历史书写中的政治权力话语对历史的裁减和拼凑，并能从地方的社会文化本身的语境出发来组合建构历史，从而赋予基层地方社会诠释历史之可能。对民国时期民族边疆地区的地方社会之考察，是要力图展现具体地方的社会现代转型如何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感知下，被形塑为一种鲜活的生活体验之过程，从而探究现代性变迁中“地方”的历史经验与文化再现。所以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商会史研究中，追求对地方“历史感”之理解，其旨趣就在于揭示中国现代性变迁过程中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生活世界有着何种形态与特质。

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历史的“地方感”与理解地方的“历史感”是两种相向交集的考察研究旨趣，这使得西南民族地区的商会史研究能成为一种“新社会文化史”的考察，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以往商会史研究的关怀主旨。

五、余论

恰如王铭铭所指出的，研究中国社会的人

类学要成为一种富有洞见的历史学，则应该从那种被 20 世纪轰轰烈烈的“大历史”所舍弃的“小传统”的冷静中，去寻找历史的结构与意义。^[30]也正如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虽然 20 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剧烈重大的，然而在这样一种“热历史”之中，更不能忽视民族边疆地区的许多“小地方”仍保持延续了某些“冷社会”的特质。这也就要求相关的社会历史研究必须借鉴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从考察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构建相应的研究范式。

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野、考察方法和关怀旨趣，吸纳到西南民族地区商会史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围绕着 20 世纪民族地区社会转型这一主题，基于地方档案材料和民间文献，以及商绅人物的口述史访谈资料，对民国时期地方商会的组织运作及其参与地方社会事物的情况进行考察。并以一些地方重要人物的生命史为线索，呈现当地商绅的人生实践和当时社会的伦理精神。进而从相关社会记忆的生成框架与运作机制中，完成对民国时期民族边疆地区的社会生活、人物生命与文化观念的理解把握，从而探析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节点上，在社会结构与观念心态的变迁中，民族地区到底存在着何种断裂和延续。最终在研究旨趣上落实一种具有“地方感”的历史研究，并完成一种具有“历史感”的地方考察。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构建尝试，还需要许多相关经验研究的支持和理论探讨的补充，但坚持下去就可能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并能促进民族史、区域史、社会文化史等相关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周智生. 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 以滇西北为中心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9.
- (2) 朱英. 中国商会史研究如何取得新突破 [J]. 浙江学刊, 2005, (6).
- (3) [美] 杜赞奇, (王福明译). 文化、权力与国家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2.
- (4) 朱英. 转型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 [M]. 上海: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3.
- (5) 费孝通、张之毅. 云南三村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485 - 505.
- (6) 费孝通、吴晗等. 皇权与绅权 [M]. 学风出版社, 1949, 34 - 35.
- (7) 费孝通. 中国绅士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58 - 70.
- (8) 周智生. 近代丽江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兼与大理白族“喜州商帮” [J]. 史学论丛, 2006, (8).
- (9) 杨煜达. 滇西民族商业资本的转化与近代社会 [J]. 云南社会科学, 2001, (4).
- (10) 杨启昌. 重唤纳西族开拓经商的民族精神 [J]. 民族学, 1995 (1、2 辑合刊).

- (11) 马敏. 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3, (9).
- (12) 朱英. 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416.
- (13) 周泓. 群团与圈层——杨柳青: 绅商与绅神的社会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38 - 249.
- (14) 余英时. 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5) 张小军. 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 [J]. 历史人类学学刊, 2003, (1).
- (16) Emiko Ohunki-Tierney. Introduction: The Histor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 [J]. *Culture through Time*, ed. Emiko Ohunki-Tierne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 - 23.
- (17) [英] 彼得·伯克著, 刘永华译. 法国史学革命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74 - 87.
- (18) 萨林斯著, 蓝达居等译. 历史之岛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3.
- (19) 黄应贵. 历史与文化——对于“历史人类学”之我见 [J]. 历史人类学学刊, 2004, (2).
- (20) [法] 勒华拉杜里著, 许明龙、马胜利译. 蒙塔尤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2 - 12.
- (21) 安顺市档案馆与西南民族大学合作编辑. 民国安顺县商会档案史料汇编 [G].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 (22) 王铭铭. 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8, (2).
- (23) 刘琪. 命以载史: 20世纪前期德钦政治的历史民族志 [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 (24) 张原. 口述历史: 社会生活的历史闪现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8, (5).
- (25) [法] 哈布瓦赫 (毕然、郭金华译). 论集体记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68 - 69.
- (26) 汤芸. 社会记忆·景观·叙事 [C]. 中国人类学评论 (第2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7.
- (27) [美] 康纳顿 (纳日碧力戈译). 社会如何记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8.
- (28) 杨念群. 空间·记忆·社会转型 [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28.
- (29) [美] 杜赞奇 (储建芳译). 地方世界: 现代中国的乡土诗学与政治 [C]. 中国人类学评论 (第2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7.
- (30) 王铭铭. 走在乡土上: 历史人类学札记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22 - 323.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outhwestern Ethnic Region

ZHANG Yuan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make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outhwestern ethnic region and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transition in ethnic border area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Constructing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study based o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 terms of research view, method and care purport can not only widen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but also fill in the gaps in previous studies of this field.

[Key word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e history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ethnic regions; research paradigm

(责任编辑 红梅)